

# 虎子器形起源之说辨析

焦存超 罗月

**摘要：**古籍文献及相关出土文物证明了虎子器形来源于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和麟主伏虎两种古时之说皆为古人杜撰。今有部分学者推测虎子器形由青铜匜演变而来，此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依据，但过于武断，需要更明确的文字及其它相关材料来证明。因此，虎子器形起源之说目前仍无定论。

**关键词：**虎子；溺器；青铜匜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9)05-0092-06

##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界围绕各地出土的一种不同材质的长体伏虎形文物用途有过一场辩论（以图1为代表），以屠思华、倪振逵、曾凡、孙桂恩等为一方，倾向认为其为酒器、茶具、盛水器等用具；一方则以黄文宽为代表，认为此种器形为男性专用的溺器。70年代之后，多数学者普遍持此器为溺器或溺器之属的观点。2008年版《中国文物大词典》将这种器形文物定义为虎子，并归为男子便器之属：“虎子，又称‘械’。约出现于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便器，一说为盥洗器。形似伏虎，故名。早期呈卧虎状，昂首，张口，鼓目，四足屈尊，腹侧刻双翼。背部有提梁，或绳索式，或塑成一小奔虎状。”



图1 三国时期的青瓷虎子

古代男性专用溺器，远在西周即已有之。《周礼·玉府》载：“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褻器。”郑玄对此注云：“褻器，清器，虎子之属”。《周礼正义》亦云：“凡私褻之用器，亦谓之

- ① 目前学界认为历史时期的虎子有两种器形：一是圆体形，一为长体伏虎形，本文讨论的虎子主要为长体伏虎形的器物。
- 屠思华、李季昭《南京梅家山六朝墓清理记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 倪振奎《关于“青瓷虎子”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 曾凡《关于“青瓷虎子”用途的新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 孙桂恩《谈谈青瓷虎子的两种用途》，《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 黄文宽《从广州出土的虎子谈虎子的考证》，《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
- 吴文信《江苏新沂东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黄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9期；周燕儿《刍议青瓷虎子的用途》，《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李小平《关于虎子用途之考辨》，《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黄展岳《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文物》1999年第5期；李晖《兽子、虎子、马子——溺器民俗文化抉微》，《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冯双元《也谈“虎子”与“马子”》，《东南文化》2006年第5期。
-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中国文物大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 此物1996年1月在马鞍山市东苑小区东吴墓出土，现藏马鞍山市博物馆。
-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6《玉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6页。

收稿日期：2019-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重视角下的晚清至民国中国城市粪秽处理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BZS104）、长江师范学院科研资助项目（2017KYQD101）成果。

作者简介：焦存超（1982-），安徽凤台人，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环境史、灾害史。

罗月（1991-），重庆涪陵人，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褻器……虎子，盛溺器，亦汉时俗语”。可见，作为男性溺器的虎子早在西周就已在周王宫中使用。但虎子只是汉时称谓，汉代以前，这种用于小便的器具被称为“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对此有解释：“械，械溺……褻器也……吕静云：‘械溺，褻器也……’裴驷按：苏林曰：‘……贾逵解《周官》，械，虎子。溺，行清也。’孟康曰：‘厕，行清；溺，行清空中受粪者也。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曹，谓之溺。’玉裁谓：贾、孟说是也。虎子，所以小便也”。综合此段文献可知，在西周时期，古人用于大小便的器具是分开的，用于小便的被称为“械”，大便器具则被称为“溺”，两者合称“械溺”，并将两者归于褻器之属。然而，对于名为“械”的器具，相关历史文献中并无关于描述其大致形状的记载，在后世社会和考古发掘中亦未发现具体的实物遗存。目前，根据各地相关出土文物情况，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汉代以降，社会中的虎子器形多是长体伏虎形。为何被称为“械”的小便用具在汉代被普遍塑造成长体伏虎这一“造形优异”的形状，其原因说法从古至今多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其二，麟主伏虎的神话之说；其三，当今部分学者推测由青铜匜演变而来之说。此三种说法究竟孰为合理，本文尝试运用文献考证结合出土文物，以及对文物特征分析和统计的方法进行辨析。

## 二、虎子器形三种起源说辨析

### （一）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说

关于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之说，最早见于《西京杂记》：“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髀髀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溺器，示厌辱之也。”此处即说汉将军李广射杀猛虎后，用铜铸造卧虎之形的小便用具。管见所及，此是虎子器形来源之说的最早记载。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及其作为史料所具备的价值，后世多有争议，顾颉刚曾指出：“在这本书里，讲了汉朝的许多故事。书的作者是谁？没有定论。有的说是刘歆，有的说是晋朝葛洪”。但余嘉锡认为，此书“旧本题晋葛洪撰……杂采诸书，托之刘歆，又可见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又说：“其书决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葛洪去汉不远，又喜钞短杂奇要之书，故能弄此狡狴。盖其书题为葛洪者本不伪，而洪之依托刘歆则伪耳”。余先生虽承认《西京杂记》为西晋葛洪伪托刘歆之名而作，但认为此书所录内容大致可信。那么，《西京杂记》所载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一事是否就是虎子器形的真正来源说法，下面将对此进行辨析。

其一，考古报告指出，早在春秋至西汉早期就已有长体伏虎形器物。1980年长沙五里牌墓葬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木制长体伏虎形漆器（见图2），黄纲正认为这是当时已发现的虎子中时代最早的一件。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M249汉墓出土了一件长体伏虎形器，经考古学者详细考证，M249汉墓所属具体年代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1985年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谏壁镇春秋末期墓葬出土了另一件青铜材质的长体伏虎形器（见图3），当时的考古报告认定此“是迄今所见古代虎子中年代最早的一件”<sup>①</sup>。1990年4月，陕西临潼新丰镇鸿门村也出土了一件铜虎子，当时的报告认为其所属时代当为西汉早期<sup>②</sup>。此外，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亦藏有一件木雕彩绘漆虎子（见图4），其所属年代被认为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或为公元前3世纪<sup>③</sup>。这五件虎子文物所属年代的断定，说明在汉武帝以前，就已有长体伏虎形虎子存在，尤其是1985年丹徒县谏壁镇出土的青铜虎子，将虎子出现的最早时代往前推至春秋晚期。由此可见，早在春秋至西汉早期就已存在长体伏虎形的虎子。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12，中华书局，1987年，第461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6篇上《木部》，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54页。

倪振奎《关于“青瓷虎子”问题》，《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5，中华书局，1985年，第38页。

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17《子部八》，中华书局，1980年，第1016页。

《长沙五里牌战国木椁墓》，《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岳麓书社，1982年。

黄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9期。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陈耀钧、阎频《江陵张家山汉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1985年第12期。

①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② 由更新《临潼出土的几件铜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5期。

③ 黄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9期。



图2 战国中期的彩漆虎子<sup>①</sup>

图3 春秋墓葬中出土的青铜虎子<sup>②</sup>

图4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木雕彩漆虎子<sup>③</sup>

其二，历史文献亦可证明虎子之属的出现时间早于李广射虎一事。东汉时期的应劭在《汉官仪》中有云：“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坐）唾壶，朝廷荣之”。据此可知，汉武帝时，孔安国曾任侍中，由于其贵为儒者，故让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汉武帝免其卑贱的执虎子之责，而只让其执唾壶。虽然李广亦同为汉武帝时名将，但汉宫中帝王所用的溺器虎子之名和器物，在汉武帝之前就已存在。宋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和清姜宸英的《湛园札记》两书均直引《西京杂记》中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之故事，纪昀对此却有所指正：“《文昌杂录》七卷，宋庞元英撰……元丰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时官制初行，所记一时闻见，朝章典故为多……又以虎子为出于李广射虎事，不知孔安国为侍中，以儒者不执虎子而执唾壶，其事已见李广之先，未免稍有舛误”；“《湛园札记》四卷……国朝姜宸英撰……是书皆其考证经史之语，而订正三礼者尤多……引李广铸虎头为溺器为虎子之始，不知汉制侍中所执乃在广前”。可以看出，早在清代，纪昀就已认识到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之说不合史实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西京杂记》虽最早记载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一说，但此说显系后人杜撰，不足采信。

## （二）麟主伏虎的神话说

此一关于麟主伏虎的神话最早见于元代陈芸的《芸窗私志》：“客问瑶卿曰：‘溺器而曰虎子，何也？’答曰：‘神鸟之山，去中国二十五万里，有兽焉，名曰麟主，服众兽而却百邪。此兽欲溺，则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国制溺器，名虎子也。’”此即谓古人将溺器塑造成伏虎的形状是来源于麟主伏虎的传说。尽管《芸窗私志》并未注明麟主伏虎神话的最早出处，然据笔者所见，与此神话最接近的记载见于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在《海内十洲记》中神兽并不叫麟主，而名曰猛兽。故事大意为：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西方月支国国王遣使向武帝进贡两件神鸟之山之神物：一件是可使人起死回生的返魂香四两，一件是形如小狗、身小如狸的神兽一只。尤其是神兽，其体形虽小，但威力无比，能兴云致雨，且其叫声如雷，可震动周遭万物，可制伏百兽，“其寿不穷，食气饮露，解人言语，仁慈忠恕。当其仁也，爱护蠢动不犯虎豹；当其威也，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百物，惊断絙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骖。处于太上之厖，役御狮子”。

汉武帝因忌惮神兽的威力，欲用上林苑中猛虎将其搏杀，但神兽未至，猛虎皆已受惊伏地。而神兽见到猛虎，更是直接爬上虎头，向虎口撒溺，“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于是虎闻兽来，乃相聚屈积如死虎伏。兽入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步已来，顾视虎，虎辄闭目”。然而，与《海内十洲记》这段描述类似的记载还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文笔稍有出入：

汉武帝时，大苑之北胡人有献一物，大如狗，然声能惊人，鸡犬闻之皆走，名曰猛兽。帝见之，

此文物 1980 年在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

此文物 1985 年出土于江苏省丹徒县谏壁镇春秋墓葬中。

此虎子出土于长沙，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汉]应劭《汉官仪二卷》卷上，载[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37页。

《文昌杂录 提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子部，第862册，第649页。

《湛园札记 提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子部，第859册，第567页。

《博物丛编·禽虫典》卷126《异兽部纪事》，《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第64222页。

[汉]东方朔撰，王根林校点《海内十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汉]东方朔撰，王根林校点《海内十洲记》，第108页。

怪其细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见此兽即低头著地，帝为反观，见虎如此，欲谓下头作势，起搏杀之。而此兽见虎甚喜，舐唇摇尾，径往虎头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闭目低头，匍匐不敢动，搦鼻下去，下去之后，虎尾下头去，此兽顾之，虎辄闭目。

由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张华的《博物志》与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所述内容皆同为一事，只是文笔略有差异，在张华笔下，猛兽并未向虎口撒溺，而是“搦虎面”。因此，若将《海内十洲记》与陈芸《芸窗私志》所述内容相比照，基本可以确定，陈氏之说源自《海内十洲记》，应无疑义。然而，纪昀却指出，《海内十洲记》“旧本题汉东方朔撰……盖六朝词人所依托”。鲁迅亦言，《海内十洲记》虽旧题汉东方朔撰，但此书多是六朝“方士窃虑失志，借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而已”。若纪昀和鲁迅的说法无误的话，那么《博物志》应早于《海内十洲记》，如此，则最早记载神兽伏虎的神话应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六朝时，方士们借东方朔之名对《博物志》所载猛兽伏虎的神话加以改动和细化，将“搦虎面”改作“溺虎口”，到了元代，陈芸则在《海内十洲记》的故事之上加以虚构（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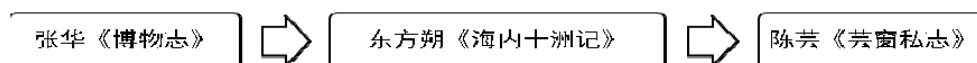


图5 麟主伏虎神话源流图

因此，尽管《芸窗私志》作为传世文献记载了虎子器形来源于中国古代麟主伏虎的神话一说，但此说只是陈氏在以往神兽伏虎传说的基础上附会、虚构之言。此外，即便我们假设西晋时期的古人依据当时的神兽伏虎神话，刻意将溺器塑造成伏虎的形状，但前文提及伏虎形溺器在西汉之前就已大量存在，则证明了此一假设并不能成立。

### （三）青铜匜演变说

此为当今学者的推测说。有学者依据文物器形特征的演化，认为虎子形器应源于一种盥洗器——青铜匜（以图6为代表），持此看法的有孙桂恩和黄展岳，二人皆认为长体伏虎形器由青铜匜演变而来。但二人皆为推测，并未做深入分析和探讨。

关于青铜匜，《中国文物大词典》的定义为：“盥洗器。西周中期出现，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是体现周礼的重要礼器之一，常与盘组合。形似瓢，瓢颈为流，下有四足较多见。四足有兽腿形、兽形、人形等。后端设龙形鋬，有龙首探出匜口。龙首上有三种类型的角：螺旋形、曲枝、长颈鹿角，龙尾作小钩形。有盖匜十分少见。春秋时有三足和无足的匜。”在传世及出土的青铜匜中，按照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图6 春秋晚期的虎头匜<sup>⑦</sup>

据笔者所见，台湾学者姬秀珠的《仪礼沃盥礼器研究》应是目前学界收录、探讨青铜匜最多的著作。该书共收录了68件器形完好的传世及出土青铜匜，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每件器形的特征及所属大致历史时间段。笔者参考此书的相关图文信息，从匜的器形部分特征等角度对其进行统计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所得数据指的是某种样式青铜匜占属于该时期全部青铜匜的比率，比率愈高，说明某种样式的青铜匜在此时期愈为普遍存在；反之，则意味着稀少。

首先，在底足上呈现了由四足到无足的变化。统计结果发现（见图7），四足匜从西周时期的100%比率，逐渐降到春秋时期的55%，而到了战国时期，只有7%的比率；与此相反，三足匜和无足匜皆由西周时期的0比率大幅攀升，尤其是无足匜在战国时期达到了60%的比率。这种变化趋势可以说明：西周时期主要为四足匜，但在随后逐渐减少；三足和无足（圈足）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此后逐渐普遍存在，到战国

[晋]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卷3《异兽》，中华书局，2014年，第35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142《小说家类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94-995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孙桂恩《谈谈青瓷虎子的两种用途》，《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黄展岳《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文物》，1999年第5期。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编《中国文物大词典》，第246-247页。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9页。

此文物1988年出土于山西太原市金胜村赵卿墓，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时期无足匜尤为流行。对此，姬秀珠有类似总结：“青铜器匜的‘足’，西周中、晚期，多四足。春秋时期，有三足、无足和圈足。战国时期，一般均无足”。概而言之，从西周至战国，青铜匜在底足上出现了由四足到无足（圈足）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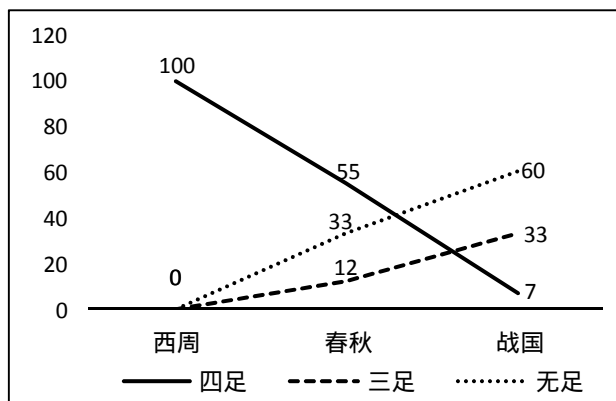


图7 西周至战国时期不同足式青铜匜占同期比率变化趋势<sup>②</sup>（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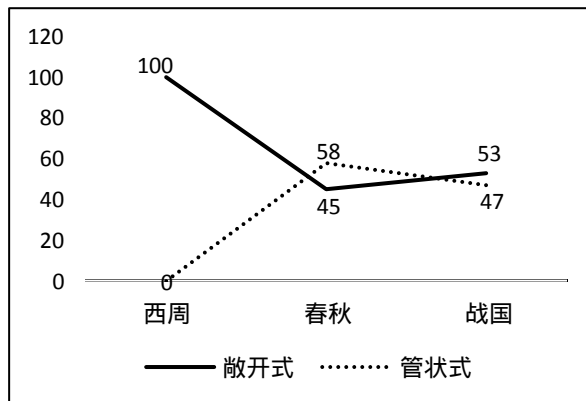


图8 西周至战国时期不同流口式青铜匜占同期比率变化趋势（单位：%）

其次，在流口的形态上出现了由敞开到管状式的变迁。“青铜器匜的‘流’，有‘槽流’和‘管流’两类”，槽流口即敞开式流口。统计结果发现（见图8），敞开式在西周时期的比率为100%，随后降到了春秋时期的45%，战国时期有小幅回升，而管状式流口匜却从西周时期的0比率陡然增至春秋时期的58%，虽然战国时期降至47%，但与敞开式的53%比率差距并不大。这种变化趋势说明：西周时期的匜全部为敞开式流口，到了春秋时期，管状式流口匜开始逐渐流行，在当时社会上较为常见；战国时期，虽然敞开式和管状式各自都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但仍可以说明此时期管状式流口的青铜匜较普遍存在。概而言之，从西周至战国，青铜匜在流口上出现了由敞开式到管状式的变化趋势。

此外，春秋至战国时期的众多管状式流口匜，在设计上还出现了一些龙首和虎首形的流口（见图6），马承源先生指出：“春秋以后，匜的流做成兽头形的”，比如《中国青铜器辞典》即收录了春秋晚期的龙首变形龙纹匜、兽首匜等，同时亦收录有众多虎首形流口匜，如春秋早期的虎形匜、春秋晚期的交龙纹匜、战国早期的虎首流匜等，这些匜的管状式流口均被塑成虎首张口的形象，与后世虎子的形象颇为类似。

综上分析，可知青铜匜从早期的四足逐渐演变成三足，再到无足；在流口设计上也从早期全部的敞开式流口渐变成管状式流口；也多出现了龙虎之类的兽首形流口。此外，其总体造型也由繁复走向简单，“战国中、晚期以后，青铜礼匜的外形逐渐走向简单、轻薄、无足、无耳的铸造方式”。这些特征的变化已渐趋吻合虎子的部分器形。因此，可以看出孙桂恩和黄展岳两位学者的推测是有其一定依据的。

然而，黄纲正对此却持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尽管春秋至战国秦汉时期的铜匜，经历了从有足到无足，从兽形或类兽形带兽头釜，变成平底带釜，最后变为平底带环或无环，纹饰由重环纹、窃曲纹、瓦纹等变为素面无纹。但是虎子是否就是由匜演化而来，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尚难定论<sup>①</sup>。笔者认为黄纲正的说法是比较谨慎的，即便青铜匜部分特征的演变在春秋以后与虎子器形已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但由于缺乏更

姬秀珠《仪礼沃盥礼器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第586页。

此图根据《仪礼沃盥礼器研究》相关内容统计出的数据而制作。来源：姬秀珠《仪礼沃盥礼器研究》，第466-563页。图8同。

姬秀珠《仪礼沃盥礼器研究》，第586页。

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陈佩芬编著《中国青铜器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219页。

陈佩芬编著《中国青铜器辞典》，第1220页。

陈佩芬编著《中国青铜器辞典》，第1216页。

陈佩芬编著《中国青铜器辞典》，第1219页。

陈佩芬编著《中国青铜器辞典》，第1224页。

姬秀珠《仪礼沃盥礼器研究》，第592页。

① 黄纲正《长沙出土的战国虎子及有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9期。

明确和直接的证明材料，因此仅依据器形特征的部分吻合而推断虎子器形是由青铜匜演变而来，这种说法显然过于武断。至于虎子器形究竟是否来源于青铜匜或者其它文物造型，尚有待于将来更多明确文献的发现以及相关文物的出土来证明。

### 三、结论

关于李广射虎一事，《史记》载：“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这一后世皆耳熟能详的典故因出自司马迁笔下，此后的《汉书》亦转录此事，其它文献毋庸赘言。因此《西京杂记》所云李广射虎而铸虎子溺器一事犹如正史所记，后世之人对此罕有质疑之声，今亦有部分学者援引此说，以此为证，然参考其它文献及出土文物，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虎子器形来源于麟主伏虎神话一说，通过对文献文本的考辨，证明此说只是后人在前人记载的基础上附会并加以虚构。因此，李广射虎而铸虎形溺器和麟主伏虎神话两种古人之说虽皆来自传世文献记载，实则不足采信。当今部分学者推测虎子器形由青铜匜演变而来一说虽有其一定的合理依据，但因缺乏确切的文字及其它相关材料证明，故虎子器形的起源之说现在仍难以形成定论。

（责任编辑：陈剑）

---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871-2872页。

[东汉]班固《汉书》卷54《李广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444页。

李晖《兽子、虎子、马子——澍器民俗文化抉微》，《民俗研究》2003年第4期；李铎等《“虎子”的用途及相关文化》，《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